

媒人现象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

金 陵

(吉首大学文学院张家界校区大学语文教学部 湖南张家界 427000)

Matchmaker is a special historical folk phenomenon, and a specific cultural symbol. Matchmaker arose from the emergence of monogamous marriage,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history in the prevention of arbitrary nature, marriage protection security, improving and standardizing ceremony. Matchmaker will not quit the stage of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role of a matchmaker in society will be more clear.

Keyword: matchmaker wedding ceremony marriage folk culture

内容提要 媒人是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民俗现象,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媒人随一夫一妻制的聘娶婚的出现而出现,在防止男女乱性、保障婚姻安全、完善规范礼法等方面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媒人不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新的历史时期,媒人的社会作用将更加彰显。

关键词 媒人 礼法 婚姻 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92.22

文献标识码 A

如果在太阳底下,我们小心翼翼地撩开民俗文化的薄纱,就会有趣地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婚姻史上,活跃着这么一群特色人物——她们为消除世上的单身情歌而不懈努力,四处游走,在婚姻功劳册上,至少有一半是她们的辉煌。她们的身上辉映着太阳的余光,是她们把单身的男女引进了婚姻的殿堂。凡是有婚姻经历的人,对于媒人这个词大抵是不会陌生的,甚至还会饱含切肤之情的。媒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卑微又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与价值,都使她们身上洋溢着神秘的光环。

关于媒人的产生,在民间文学里,有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很久以前,渭河两岸的人民很少来往,更谈不上结亲了。有一年,渭北的一个后生偶尔去渭南办事,看上了那边的闺女。一个老婆婆知道了他的心思,主动从中撮合,最终结成了夫妻。一年后,媳妇生下个大胖小子。丈夫眉开眼笑,说:“咱俩素不相识,经那婆婆说合,就成了一家人,你说奇不奇?”妻子说:“是啊,可那婆婆已不在人世了,想报答也来不及了。”于是,夫妇俩用米粉为婆婆塑了一个像供奉起来。又怕有人看见笑话,就在夜里供,白天藏在柜里。过几天,这人像发了霉,他

们就称她是“霉婆”,依旧当活宝般供奉。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想娶渭南婆姨和想嫁渭北汉子的男女,都设法找“霉婆”这样的好心老太牵线搭桥。再往后,做“霉婆”者觉得“霉”字不好听,便将它改成“媒”字。

这是从民间文学角度对媒人的产生所做的注脚。既是文学,便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虽然合情合理,但若从严格的考证学角度来说,自然不足为凭。那么,媒人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史书似乎没有确切记载。但媒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却是不争的事实。《氓》里面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记载。《战国策·燕策》也有“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的议论,都说明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在《诗经》中,多次提到“媒”的作用。《诗经·邶风·伐柯》这样说:“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意思是:没有斧头砍不出斧柄,没有媒人娶不到妻子。这些诗句充分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媒人便已成为婚姻中的钥匙型人物,无媒不成婚,职业或半职业的媒人在那时就已产生。不过,在春秋战国之前,虽有“处女无

媒,老且不嫁”的规矩,却也有自由恋爱的风气。性爱是开放的,婚恋是自由的,爱情伊甸园是敞开的,完全是一个“男女杂游,不聘不媒”的青春时代。这在《诗经》中就有充足的表现。《周礼·地官》也有如是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春暖花开,情思飞扬,有情人可自由苟合,山林、草丛,到处都可构筑爱语之巢。没有人媒,只有地媒和天媒,这是人类的爱情童年时代。可以想见,当年的青年男女有自由追逐爱情的权利。也可看出,“不聘不婚”的习俗尚处于形成之中,与原始的“不媒不聘”习俗处于交叉时期。可以推断,“非媒不得”的习俗在统治阶级中较为推行,而“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的自由婚恋则主要存在于庶民之中。

据史料分析,媒人的诞生遵循这么一个轨迹:随着一夫一妻制的聘娶婚出现,自由婚恋无奈出局,包办婚姻闪亮登场。男婚女嫁由当事人作主转为“父母之命”作主,而父母之命又往往以“媒妁之言”表现出来。因当时各氏族之间交往不密,必须要一个中间人周旋协助才能使婚姻臻于完美。于是,媒人便响应时代的号召,应运而生。可以说,媒人是社会发展的特殊产物。我们还可以从“媒妁”两个字中获得玄机。《说文解字》云:“媒,谋也,谋和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媒人的职业,说文雅点,是“通二姓之好,定家事之道”,说通俗点,就是撮合男女之婚事。中国一向是个尊重礼法的国度,“媒妁之言”一旦以礼法的身份被定格下来,它也就必然得到了相应的文化获准。“三媒六证”、“明媒正娶”、“天上无媒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等俗语,精当地表现了媒人在婚姻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使媒人身上涂上了宗教般的文化神光。世上有服从礼法的乖乖人,可也有不服礼法的硬骨头,私奔便是挑衅礼法、笑傲媒妁之言的强力冲击波。私奔的前提是二人有情,父母却不允诺,于是干脆省却媒妁中介,直达婚姻目的。达到了目标,却招致了蓝色流言,诸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等语便充分说明了无媒婚姻之可耻与不齿。故,历史上多半私奔者哪怕成功了,也会身不由己坠入谣言的万丈深渊,凛冽而寒骨。即便历史上有人为司马相如与王卓君的义举大唱赞歌,那想必也只是人们对才子佳人美好姻缘的怜香惜玉情怀的一种尽情释放而已,他们并没有推翻媒妁之言!笃守礼法的每一个人,都是不敢轻易得罪媒人的,媒人就是砍柴的斧、切菜的

刀!所以在某些地区,媒人地位显赫无比。比如某地就有这么一个习俗:吃饭时将媒人恭为首席,其他人按辈份或地位依次就座。斟酒也从媒人杯子点起。放碗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头座不放碗,全桌撑得白骨眼”!媒人没吃完,其他人也都得陪吃,不许提前放碗。

媒人的产生是因婚姻制度而成,故,因聘娶婚确立而产生的合婚之媒,便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中的作用。

第一,隔离男女、防范乱性的作用。

原始时代,风气浪漫,社交开放,只要两情相悦,便可快乐组合。想唱就唱,想要就要,无须媒人。如列子的《汤问》就说道:“男女杂交,不媒不聘”。一方面可以说,这种自由开放的风气确实风情浪漫,令人神往,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何尝又不是乱性的表现!人类历史上有这样的记录:“十萬年前,欧洲有一支尼德特人,身体健壮,却从地球上神秘消失。消失的原因,既非天灾,也非病魔,而是两性生活无规则的恶果。男女之间无约束的杂交,为争夺异性,氏族内部成员相互拼杀残斗……最后一蹶不振,日趋衰落,直至消亡。”^[1]我国先民们早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中,看到了两性无约束的放纵之危害,遂以婚姻的形式保障了性爱的纯洁。一旦婚姻制度披上了封建礼法的外衣,杂交便不再成为令人赏识的文化许可,它也开始服贴于严厉的礼制,男女有了明显的区别,男女授受不亲了,媒人的权限也就无限扩大。故而《曲礼》中说:“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没有媒人的穿针引线,男女双方是不能提前相交的,甚至连对方的模样都是不能提前相识的。尤其对女性而言,贞节观像孙悟空的小花帽一样紧扣头上,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如果无媒而交,自作主张,或者自托媒人,都将视为淫佚之事,为人唾弃。故古人有曰:“男不亲迎,女不亲求”。而有了媒人的许诺,纵然是烈火遇干柴似的艳情,也可以合理合法。汉代的董永七仙女如胶似漆,何况还是令人艳羡的神人之恋,但他们也少不得请出土地爷、槐荫树为媒,方才成就一段天上人间的美满婚姻。故从客观上来说,媒人的出现,在防止乱性、保障婚姻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凡男无家女无夫者,即为主婚,以王命会之,免其怨旷,一则保人廉耻,一则顺民所欲……俾鰥寡者各如其愿,无私合之名,免淫奔之俗,于社会风化所关甚大也。”^[2]说的就是这个理。

第二,完善婚制、规范礼法的作用。

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法”“礼”合一。合礼即合法,合法即合礼。《周礼·地官》即有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管子》亦云:“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鰥,妇人无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食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足见,西周春秋已有官媒,如同今之民政局结婚登记处,为婚姻打造了人性化的保险箱。其后私媒兴起,虽散落民间,但同样具有法律保障效果。然而,周代民间虽有无媒不婚的习俗,但它还只是一种社会默契,是流行于人们行为礼仪的社会共识,并未见诸法律。正式在法律中规定婚礼必须有媒的是唐代,唐代正式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3]、“嫁娶有媒”^[4]。民间也有“无媒不得选”之说^[5]。其后,宋元明清历代法律,都对媒人在婚姻中的彰显地位作了相应规定。尤其元代,除规定婚礼中必须有媒之外,还规定了民间的婚姻必须订立婚书。这纸婚书为婚姻提供了具体切实的保障。《元典章》记载当时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如同今天颁发的营业执照一般,保证了媒妁工作的权威性。媒人的安置,使媒妁婚姻成为合法,颇有点来头不小的味道,再加上上层人物的夸张炫耀,遂使媒人主婚徒添了豪华的气派。媒妁代表了婚姻伦理的最高原则。也只有这样的婚姻才有尊严,婚姻的生命也才能锁进一只特制的保险柜里。尤其对女人,无媒之婚一旦有了异遇,丈夫可以无情抛弃甜蜜时分的信誓旦旦。理由很简单:没有媒证。而女人如果是明媒正娶过来的,即便丈夫休弃,也会多少有点惧意,女人也可以挣得捍卫自己的丁点权利,理由同样很简单:我可是明媒正娶的。明媒正娶的,便谓结发夫妻。结发夫妻轻而易举撵下堂,也是难以逃过许多人的脸色的。媒妁是全民族性的婚姻中宗教般的密旨,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生存、繁衍下去的强挺的理由。

第三,联系嫁娶、传声联络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与其说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还不如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而实际上又是政治的结合。正如恩格斯所说,阶级社会婚姻“是一种政治上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6]因此,人们一直称婚姻为“大事”。即是家族大事,必须要考虑双方门第、品貌、财富等是否门当户对。而这些因素,当事人由于交往之陋而不甚了解。尤其女性,长居闺阁,其品行之优劣、相貌之俊丑,对外界来说,简直讳莫如深。出于女性的羞涩,更出于礼教的束缚,女性根本无法推销自

己。而为人父母,亲自操持儿女之婚姻大事,也多有不便。《庄子·寓言》所说“亲父不为其子媒”,想必里面隐含着些许复杂又无奈的情愫。而媒人因职业之优势,进东家,出西户,周围姑娘小伙的个人档案无不烂熟于心,这些都是那些父母们望尘莫及的。遇到条件匹配的,媒人便自告奋勇,从中穿梭,协调利害,缓和矛盾,玉成好事,其间起到了传声、联络的重要作用。

媒人在丰富婚姻内涵、规范封建礼法方面着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扮演着护卫婚姻礼法的角色,她们身上,散发着浓浓的礼性气息。她们在中国的出现及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色文化。媒人不知映红了多少年轻人的婚姻,同时,媒人也不知摧折了多少有情人的爱情之花,造就了多少婚姻错误!可以说,媒人能够使爱情的新月变成满月,也可以使满月变成残月。所以,在我们这个人多嘴杂的国度里,对媒人的审谛也就多了几层含义。尝到了爱情滋味的,血管里流动着感激与希冀,对媒人产生宗教般的虔诚与感恩。《西厢记》里边的巧嘴丫环红娘,热心助人,成人之美;《婿店》里边的那位“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慈祥老者,都是为人爱戴的“超级媒人”。她们身上,沐浴着健康人性的光辉。而在更多的文学作品里边,媒人则是经过异化处理了的人物。冯梦龙在话本里就感叹写道:“三姑六婆,嫌少争多。”分明写出了对媒人的嫌恶之情。而在诸多戏曲里媒人则往往以丑角出现。特别是媒婆,鬓发上插一朵大红花,两个脸垛子扑满“红血丝”,嘴边点个大黑痣,一张殷红大嘴,走路左右摇曳,精怪而妖冶。这种形象早已在戏曲里面定格,已经演绎成一种文化符号。当然,丑角的定位,是和媒人的某些特点分不开的。譬如媒人能说会道,巧嘴如簧,欺男骗女,能让野鸭变天鹅,能让星星变月亮。媒婆的嘴又红又大,她们撮合过多少桩红色婚姻,说过多少“真实的谎言”呵。而媒婆那颗黑痣,则是她们能说又好吃的文化诠释,一个猪头,一只猪脚,一点零碎赏钱,都是诱人的尤物。就为这些,她们也愿意在信誉上作出点牺牲,为玉成好事而屁颠屁颠。而媒婆脸蛋上那两朵夸张的红晕,却正是她们审美资源匮乏的表现。媒人就凭着他们可笑的狡猾、可爱的机智、可怜的媚俗而留名传世,定格于文化。令人称奇的是,在湘西土家族的《契嫁歌》里,却将对媒人的憎恶与感恩完美地结合:试撮浪花几朵:

对门坡上栽火葱,媒人死了变蜈蚣。

对门坡上栽黄瓜,媒人死了变蛤蟆。

对门坡上撒把灰,媒人死了变乌龟。
旧时包办婚姻造就了许多伤心的婚姻,在嫁娘眼中,父母之命不能违,罪魁祸首只能是“媒妁之言”。如此婚姻,真爱得不到满足,青春黯然失色,踏入婚途,无异于踏入火坑。嫁娘对自己的婚姻不满,孱弱的生命无法抗拒强大的陋习,只能把心中的委屈不平以涕泪纵横的表情和怨气十足的憎情呕喊出来,借哭嫁的机会将媒人痛骂一顿,趁机释放一把,此时的“骂媒”是嫁娘矫正心理的“消解咒”。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痛苦的真骂。语言赤裸犀利,将对媒人的憎恨与恼怒无限扩大。媒人自知理亏,不便还口,只能灰着脸由她去骂。而有的包办婚姻甜蜜美满,嫁娘笑都还来不及,但哭嫁是必修女功,非哭不能体现自尊与价值,则此时的骂媒只当是套数学公式,当不得真的。媒人听罢,不恼不怒,甚至觉那骂声如同扑散在皮肤上的爽身粉,说不出的清爽舒服。有时得意的媒人还会趁机打趣:

我的姑娘也!
你把媒人骂死了,
人间鹊桥哪个搭?
上庙去把尼姑做,
背起包袱找男人。
头发白了还是黄花女,
八十岁的姑娘打单身。

在哭嫁歌里,也有幸福的嫁娘明表心迹以示谢意的歌词,洋溢着对媒人的感戴之情。此时的媒人便会获得一种受宠般的自尊与满足。

可见,把骂媒全部诠释为对媒人的喷血诅咒,其实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今天,应该对骂媒现象进行审美性修订,给它一个丰满的解释。

今天,青年男女崇尚“自由恋爱”,这确实是健康人性的体现。但有些人据此就贸然断定媒人就是畸形婚姻的始作俑者,将媒人毫不留情视为封建糟粕,然后拦腰一棍,将媒妁现象置于死地,还大叫:媒人,你可以下岗了!仿佛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其现代性。笔者则深不以为然。我始终坚信:媒人不仅没有下岗,而且永远也不会下岗!在已故的婚姻史里,媒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而在今天,许多年轻人哪怕自由恋爱了,步入完婚殿堂了,却还煞有介事安插个媒人进来,以求婚姻礼数之完美。此举不恰恰说明国人对媒妁之婚的尊重么!当今时代,信息万变,节奏快速,人们社交有限,人们为生存而战,为事业而忙,导致不少大男大女蹉跎青春,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迟来的爱情?媒人介绍!朋友、亲戚、同事,都可以成为穿针引线

的媒人。酒吧、歌坊、影院,都可以成为派对的浪漫处所。甚至,某些大城市还出现了这么一个令人感唱的现象:那些蹉跎青春者的老爸老妈们手持孩子的各种证件,在公园特办的“婚姻介绍所”,为孩子兜售婚恋。父母的热情让孩子们尴尬又无奈。可以说,这是新时期的婚恋怪事,这些父母们不知不觉扮演了媒人的角色。这好像又打破了“亲父不为其子媒”的古律。同样,为解决这些“婚恋困难户”,某些媒体娱乐节目也大肆炒作,“玫瑰之约”、“非常男女”等节目就分明闪烁着媒人的影子,这是时尚的媒人一族。可见,媒人没有下岗!

依靠媒人来确定婚姻的对象,不只是我国的一种民俗现象,在世界各地民族中也广泛流行。如叙利亚的一些地方就流行“敲门问嫁”的习俗。其敲门问嫁者,就是男方请来的老妇人充当媒人;日本流行的“见合婚”,也是依靠媒人来介绍、见面和说合。不仅亚洲如此,即便在一些欧洲民族中择偶依靠媒人撮合也很普遍,俄罗斯民族的媒人,分正式和临时两种,正式媒人指专职的媒婆,临时媒人则由男方的近亲、教父、教母等充任。总之,媒人现象的普遍存在是顺应了在一些民族中青年男女之间无法依靠自己的交往而相互结识,从而缔结姻缘的要求。

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改善,互联网约会使得异性交友变得更加时尚、便捷。但是很多人接触过网络交友后最终选择了放弃,其原因各异:有的不愿到网上公开隐私;有的害怕网络欺诈;有的厌倦夸大其词的虚假信息;有的面对众多网友信息不愿浪费太多时间挑选。网络交友的弊端,反倒给了传统媒人一个机会,新时代的媒人采用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他们相信人们的婚恋对象的背景应该大致相同,甚至希望双方有同样的教育背景。在媒人眼中,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远离感情的理性选择。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人仍会选择由媒人牵线的婚姻。

[1] 万建中:《图说中国民俗·婚俗》,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 年,第 4 页。

[2]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 1991 年,第 198 页。

[3] 《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中》。

[4] 《唐律疏议》卷一三《名例》。

[5] 白居易:《续古诗》,《全唐诗》卷四二五。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69 页。